

或“和卓时代”考实》,明确指出,关于 17~ 18 世纪在天山南路曾存在一个“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之说是西域史研究中形成的幻影,和卓家族中无论是白山派还是黑山派,实际都未曾作为天山南路的统治者而据有这一地区,推翻了《和卓传》英文节译本的错误构架。随后,魏先生又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 5 期上发表《主题·史料·方法》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与阐释。

笔者自 1987 年攻读研究生开始,方接触这一课题。硕士论文《明末清初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三题》(1990 年通过答辩)主要讨论了叶尔羌汗国时期的和卓家族,即它的兴起与发展。博士论文《准噶尔汗国统治下的天山南路》(1993 年通过答辩)主要探讨了准噶尔汗国归并叶尔羌汗国后至清朝统一西域期间和卓家族的活动及其灭亡。此间还发表了《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世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2~ 13 期,1989~ 1990 年)、《和卓家族兴起前伊斯兰教派在西域的活动及其政治背景》(《世界宗教研究》1991 年第 4 期)等相关论文。

- ① 这是一部写本,现藏南充市四川师范学院,线装 8 册,既无书名,亦无作者。李文典在此写本批语中将其题为《西域地理图说》。现由阮明道整理,汉文笺注,刘景宪满文译释,于 1992 年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西域地理图说注》。
- ②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首龙万育序,西域舆地三种本。
- ③ 魏源:《圣武记》“叙”,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 年。
- ④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记》。
- ⑤ 瓦里汉诺夫:《1858~ 1859 年中国天山南路六城状况》,见《瓦里汉诺夫文集》第 3 卷,阿拉木图,1985 年。
- ⑥ 见伊莱亚斯为《和卓传》英文节译本写的前言。陈俊谋、钟美珠先生将其由英文节译本译成汉文,刊于《民族史译文集》第 8 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1980 年。
- ⑦ 《和卓传》汉文节译本,《前言》,第 57~ 59 页。
- ⑧ 羽田明:《明末清初的东突厥斯坦——其回教史的考察》,《东洋史研究》第 7 卷 5 号,1942 年。
- ⑨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 511~ 526 页,中华书局,1981 年。

1995 年辽金元史研究概述

潘 清

1995 年,辽金元史的研究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有所发展。据粗略统计,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四种,各种期刊所刊论文不下二百余篇,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现将研究成果分别概述如下。

一、政治和军事史的研究

政治和军事史仍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关于辽代的政治制度,吴凤霞《辽代省制问题浅

析》(《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 1期)一文分析了辽代省制,认为辽代的省制已不同于唐末以来的重叠虚置的中原王朝的体系,中书省具有脱离原有体系的特征,成为一级行政机构。何天明《辽代契丹北枢密院的设立、职官设置及特色》(《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 3期)一文,阐述了契丹北枢密院的设立过程、职官设置及其契丹习俗和汉族政权体制相结合的基本特色,认为北枢密院的设立标志着皇权的进一步加强,体现了契丹对中原汉族文化的吸收和改造。纪宗安《耶律大石治西辽国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 2期)一文,全面概述了耶律大石吸取亡教教训结合当地传统政治经验的基本国策,高度评价了耶律大石的政治才能。

关于辽朝的军事方面,研究者们的重点主要在于讨论辽朝军制和中原汉族政权军制的不同。张国庆《辽朝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后勤制度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 4期)一文认为,辽军通过春“捺钵”和秋“捺钵”等习惯性渔猎及寒冬季节的“猎仪”等围猎活动进行的军事训练,既增加了军队的物资供应,又提高了射杀技术和整体战术水平。辽军还利用打草谷的方式保障后勤供应。关树东《辽朝的中央宿卫军》(《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 6期)一文也认为,因契丹民族固有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其中央行宫宿卫军和中原王朝的宫廷宿卫有所不同,并论及其来源、构成和变化。

关于金朝政治史的研究,李锡厚《金代的“郎君”与“近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 5期)一文,重点讨论了“郎君”和“近侍”的地位和变化。郎君是金宗室的成员,金初取代各部酋长,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力,熙宗以后其政治地位为近侍取代。近侍多无才识,其预政是金王朝南迁后迅速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两者特殊政治地位的变化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金朝政治制度的特点。董四礼《金代皇位继承制度试探》(《史学集刊》1995年第 3期)一文,探讨了金代皇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发展以及对金代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

元代部分:杨志玖近年来从事了大量有关回回人与元代政治的专题研究工作。95年度,他又发表了系列文章《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中的(五)(下)(《回族研究》1995年第 2期)文章考察了江浙、江西、湖广行省的回回官员,并依次作表加以说明。经一系列研究,作者总结出了回回人在元代行省一级官员中所占的比例。他还认为,如果研究中再添回回官员对地方经济、文化所做贡献的事实,将会加深对这一命题的全面认识。刘迎胜《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考》(《西域研究》1995年第 4期)一文,考证了在拥立蒙哥为大汗中起决定作用的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的有关问题,认为大会举行的时间应取《兀良合台传》的记载,即 1249年阴历四月,地点则位于塔刺思以北的今巴尔喀什湖某地,还理清了参加会议的各势力代表人物。另外,赵文坦《元代的刑部和大宗正府》(《历史教学》1995年第 8期)一文,论述了这两个机构的组织结构及其司法职能。作者在《中统初年宰相的任用》(《齐鲁学刊》1995年第 4期)文中,则认为元世祖当时任用的汉族士人并非许衡、姚枢、窦默等真儒,而是“士人集团”中的经济人才;当时枢密院尚未成立,中书省握有兵权,因此也多用军事人才或者军事兼经略人才。

宣政院是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军政大事的特设机构。邓锐龄《元代杭州宣政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 2期)一文,综述了杭州宣政院的建置沿革,官员行事,认为杭州宣政院形式是中央宣政院的分支,实际拥有相当的权力,主管江南佛教事务,基本是一个常识机构。张云则撰写了《元代宣政院历任院使考略》(《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 2期)和《元代管理吐蕃地方的中央机构——总制院与功能使司》(《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 1期)等文章,考证了元

代宣政院历代院使的史事,讨论了宣政院及下辖机构的体制和职能环节。他的研究表明元代对吐蕃地区的管理经验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尤中《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思想战线》1995年第2期)一文,总结了元朝根据少数民族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管理政策和形式,高度评价了其积极作用。张金铨在《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及其职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过程、管辖范围、组织结构和职权。

二、经济史研究

95年度,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林荣贵完成了《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该书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一种。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探讨了辽朝经营和开发北疆地历史活动,并将之置于整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颇有新见。

在经济史上,一般认为驱口是辽金元时代的特有阶层,李锡厚《论驱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追述了“驱口”的产生,明确指出“驱口”来源于唐朝的“驱使人”,分析了“驱口”身分的法律意义,认为其身分与自由人之间区别模糊。申友良《辽代北方城市的兴建和商业繁荣》(《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一文,阐述了辽代北方城市兴建的过程和特点,认为这些城市本身不是政治经济中心,只表明了国家的区域管理,但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任爱君《辽代地主阶级集团发展形态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6期)从辽代地主阶级集团的组成结构入手,分析认为组成的复杂性造成了地主集团的不稳定性,这也是辽代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金代人口的民族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研究难度很高。刘浦江的《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其户籍制度中的户口类别、户等制、户口统计及管理措施,深化了该项课题的研究。唐亦功在《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利用指数曲线回归方程,对文献所记载的金代京津唐地区人口的变化作了结算和研究,划分该地人口变化的三个阶段为:金初的低值期、金中后期、金末的锐减期。在赋役制度方面,刘浦江撰写了《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和《金代“通检推排”探微》(《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论文,总结出金代赋役制度具有赋役标准一致性和赋役一律性的两个基本特征,考察了通检推排制度的具体措施及演变。

元代经济史方面,陈贤春在《元代粮食亩产探析》(《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量化研究的手段,分析了元代粮食平均亩产量,使结论更趋于科学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元代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桂栖鹏《元代江南地区封建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深入研究了元代江南的租佃关系,认为元代江南的租佃关系在宋代的基础之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官田佃户普遍拥有兑佃权利,民田也出现了兑佃制。作者指出定额地租是元代江南的主要地租形态。有关赋役方面,陈衍德在《元代农村基层组织与赋役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从分析元代农村基层组织与赋役制度之间的关系入手,发现作为基层互助组织的社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及法律的严密与一般行政组织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元政府也因应了社的乡土特点,以社作为征调赋役的基层组织,从而获取了实效。曹旅宁在《元代寺院僧尼的赋役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

中,对元代寺院僧尼原则上拥有免除赋役的特权一说提出了疑问。元代盐、茶、酒、醋等日常生活用品,均由官府统一控制,统一发卖。高树林在《元朝盐茶酒醋课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中调查了这几种物品的税课情况,认为它们是元政府财税的重要来源,盐课又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晓光的《元朝的钞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一文,证述了元代钞制及其经验教训,还研究了对伪造钞币等犯罪的处罚问题。李云泉《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一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介绍了蒙元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的路线,驿站的设立及其发展变化,认为驿站的设立推动了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

三、社会文化史

辽金元时代有关妇女史研究过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较少的问题。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推动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宋德金在《辽金妇女的社会问题》(《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概括了辽金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认为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往往建立政权初期的妇女享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自由,随着时间推移,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越多,导致妇女的地位和享有自由的权利也趋于低落。托雅、嵇平平两位学者另辟蹊径,他们在《论蒙古古代战争中女性的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当时蒙古族妇女的思想观念和特点,列举了她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中的功绩。

辽金时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一直相对薄弱,1995年有了很大改观。冯继钦《契丹人与茶》(《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一文,利用历史文献和近年发掘的考古资料,特别是辽墓壁画资料,研究了中原茶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黄震云《辽代礼俗》(《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一文,介绍了辽代盛行的各种礼俗。另外,郭康松《辽代娱乐文化之研究》(《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阐述了契丹族娱乐文化的独特之处及其成因。

宋德金《金代社会与传统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分别从政治、民族融合、经济文化、艺术与科学成就、社会生活诸方面,论述了金代的统治对南宋社会及后世的影响。他在《金代的学校考试和铨选考试》(《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一文中,进一步就金代的学校设置和与之相配套的考试制度做了研究,并讨论了金代包括官员铨试和吏员补试制度在内的铨选制度,特别强调指出金代女直学校和国子学的设立开创了民族学校的先河,其试补吏员制度也对元代产生了影响。赵永春《宋金聘使对文化的贡献》(《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一文,阐述了宋金双方聘使交流的阶段和形式,评价了交流的历史意义。

95年度,史卫民的专著《元代社会生活史》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对公元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各层面作了详尽的描述,重点揭示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相互融合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内容涉及婚姻状况和习俗、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条件、伦理习俗、社会禁约、岁时娱乐等各方面,结构完整,文笔流畅。

陈高华曾从《老乞大》、《朴事通》两本朝鲜李朝时期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中挖掘材料,在《从〈老乞大〉〈朴事通〉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强调了两书的史料价值,考证其成书年代应在世宗五年(1423年)以前,认为上述两书反映了元末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市的社会生活,并研究了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赵永铤《英雄的旌

表、部众的颂歌——成吉思汗祭奠〈大祭词〉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成吉思汗祭奠中《大祭词》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叶新民《元上都的凉亭》(《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忽必烈在上都所建凉亭的作用、地理位置和管理措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朝复杂多样的宫廷生活。另外,由陈一鸣编译的美国学者保曼·D·布尔勒的研究成果《13—14世纪蒙古宫廷饮食方式的变化》(《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1期)也为我们了解蒙古宫廷生活提供了帮助。王晓清《元代关学探赜》(《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一文,系统研究了元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学的学派及其特征。沙日娜《元代图书出版事业述略》(《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从元朝对图书的搜求、出版和元版书的刻印特点入手,阐述了元代图书出版事业的概况,指出元代图书出版事业对传播和保存中国文化典籍、推动图书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四、民族和人物

1995年,寻找契丹后裔及其研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孟志东出版了专著《云南契丹后裔研究》,叶启秋和干志耿两位学者专程赴滇西考察并发表了考察研究报告《滇西契丹遗人与耶律信之裔》(《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黄震云发表了《云南契丹后裔和契丹信氏》(《思想战线》1995年第2期)。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致肯定了云南契丹后裔的存在,讨论了耶律姓氏问题,揭示其文化遗产的积极意义,建议作进一步的研究。

去年,在有关人物的研究中,学者思考的角度各有不同,对史料的挖掘也有所突破。

元代著名的回回宰相阿合马长于理财,《元史》将之列入《奸臣传》。学者也往往对他全盘否定。杨志玖、杨德华两位学者合作的《阿合马新论》(《回族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肯定了他对于当时元政府财政收支平衡所做的贡献,揭示了他之所以成为奸臣的社会原因。另一位著名人物窦默,《元史》本传中记载他“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陈高华《论窦默》(《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他的生平事略,根据有关医学著作资料论证他不是因为经术,而是因精通医术受到忽必烈重用。这类事例在蒙古南下时屡见不鲜。文中他建议对流传至今的有关医学著作进行认真的搜集整理,从中挖掘史料。著名学问家元好问对宗教史的贡献人们了解甚少,杨国勇《元好问对中国宗教史的贡献》(《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从宗教史的角度,发现元好问很多著述记载了当时的宗教活动,总结了其特点,还提供了可补史传缺陷的资料。

元代航海业的发展是郑和航海的基础。陈高华《元代航海世家澈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综述了元代航海世家澈浦杨氏和其它几个航海家族的盛衰。对这一时期出现的航海家族现象,作者认为其成功往往是以家族财富作为基础,在取得官府职务后又利用职务之便扩大家族的财富。蒙古在征服战争中曾使用契丹军,冯继钦《从战迹和官职看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分布》(《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一文,根据契丹军参加蒙古统一战争和远征西亚战争的历史活动及蒙元时契丹人任职情况等,分别按地区研究了契丹人当时的分布。宪宗朝是察合台汗国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刘迎胜《元宪宗朝的察合台兀鲁思》(《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辨析了涉及这段历史的一些问题。

五、史籍与考订

史籍、史料和考订工作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李锡厚《〈辽史〉与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 5期)一文评述了《辽史》和辽史研究概况,指出要提高辽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就要清除日本军国主义以灭亡中国为目的而散布的种种谬论,同时还应重视考古新发现。《辽史》是二十五史中缺漏矛盾现象突出的一部史书,张国庆在《论辽代石刻在疏证〈辽史〉中的作用——兼评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 5期)一文中,利用《辽代石刻文编》的材料总结了辽代石刻疏证《辽史》的种种作用,高度评价了向南先生所著《辽代石刻文编》。魏奎阁《辽天祚皇后萧氏曾祖为萧孝先考》(《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 1期)考证辽天祚皇后曾祖为萧孝先,订正了《辽史》记载的错误和矛盾。李克民在《金代曹道士碑文勘误及书法研究》(《北方文物》1995年第 4期)一文中校阅了此碑文,研究了碑文的书法艺术及其书法源流。

原河北林州宝严寺有两块元代石碑。蔡美彪《林州宝严寺八思巴字圣旨碑译释》(《考古》1995年第 4期)对其中的第一块碑文八思巴字部分,参据其汉字部分作了旁译,并对文中若干专名及有关史实进行了笺释。1994年,照那斯图在《民族语文》第 4期上发表《内蒙古科右旗夜巡牌考释——兼论扬州等处发现的夜巡牌》一文,对此牌中阿拉伯字母文字的读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为此,蔡美彪、阿西木·图尔迪、刘迎胜等学者各抒己见,整理成《对科右旗夜巡牌阿拉伯字母文字读释意见》(《民族语文》1995年第 3期)一文,目前,各位学者对其文字属性取得了一致性意见,认为该文字是波斯文,但对其中具体词汇的读释未能达成最后结论。许子荣、曲守成在《有关“鲸川之海”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5年第 1期)一文中,考订了《元统一志》中“北浸鲸川”(一作洲)的所在海域,认为蒙元时期称日本海为鲸海,鲸川之海是其一部分海域。任学崇《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 2期)一文,考释了元初浚州达鲁花赤述哥察儿的碑文,肯定浚县有西夏遗民的存在。

本年度还出版了《中西交流先驱——马可波罗》一书(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 1991年 10月北京纪念马可波罗来华七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其中收录了中外学者的学术论文 32篇。我国研究马可波罗的著名专家杨志玖、蔡美彪、陈得芝、黄时鉴等在会上提交了论文,分别就有关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近年来部分国外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杨志玖早期的论文《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经杨志玖先生同意,该书收录)和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者的证据和心态》都针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肯定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证明了《游记》的真实性。陈得芝《马可波罗补注数则》,对法国学者伯希和的著作《马可波罗补注》中的几点不完善处作了考订和补充,进一步证实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一文,从马可波罗没有记录茶这一事实入手,考察了 17世纪以前茶在北亚和西域的传播,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马可波罗来华的事实。蔡美彪《马可波罗学在中国》一文依据元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游记》的记事,探讨了马可波罗在华 17年的语言和观念、地位和身分及《游记》的特点。作者认为马可波罗习用波斯文,其国家观

念和政治观点与波斯人、回回人类似,而身分则应是斡脱商人,指出他的《游记》主要介绍了中国的状况。本文又一次论证了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

六 考古及其它

1995年,辽金元史的考古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陈朝伟《吉林省辽金考古综述》(《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一文,概述了建国以来吉林省辽金考古的主要收获。王未想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辽代蔡志顺墓志》(《考古》1995年第7期)一文中考释了辽代蔡志顺墓志,指出该墓志有正补《辽史》之处,为研究辽代职官提供了新材料。

由于金代铜镜的风格多样,历来为研究者关注。张占东《浅谈上京会宁府出土的金代铜镜》(《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对金代铜镜的特征发表了个人见解。田华《金代铜镜的刻款及相应问题》(《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探讨了金代铜镜的刻款形式和内容,介绍了铜镜的检验机构。

蔡美彪鉴定了1983年宁远出土的铜质八思巴文印(《元宁远务关防课税条印音译》(《文物》1995年第7期)),将此印定名为“元宁远务关防课税条印”。指出这件文物提供了罕见的八思巴字见证,有助于我们探讨元明两代税收制度和印章制度的沿革。陈国灿在《吐鲁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贴纸”浅析》(《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一文中考察了吐鲁番出土的元代“裹贴纸”的年代和用途功能,认为它具有现代包装广告的用途。李桦在《也谈岱吉屯墓出土“至正年制”碗的年代》(《文物》1995年第4期)一文中,考证认为此碗没有任何元代特征,应是明中叶的仿制品。

史 坛 信 息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

吴兆雪 杨 耕

一、问题的提出以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讨以及以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社会的动机为发端,以经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为中心,内容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以及社会形态演进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之所以重新引起中国理论界的极大关注,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当代中国重新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底蕴就在于,如何超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理。具体地说:第一,探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需要。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